

尤利烏斯·伏契克畫傳



尤利烏斯·伏契克畫傳

序

凡茨拉夫·柯別斯基

伏契克生平及著作

古絲達·伏契柯娃

譯者 張景瑜

序

我和尤利烏斯·伏契克在黨內一同工作了二十年。在這長長的時期中，有着無數美麗的回憶把我和他連繫在一起。我看着他從一個積極的革命學生工作者成爲一個文學批評家和歷史家，一個戰鬥的新聞工作者、進行罷工的煤礦工人的戰友，知識份子隊伍中的政治工作者。他爲人民而戰並鼓舞着他們爲自由而鬭爭。他是反對法西斯暴行的最倔強的戰士，最後也是法西斯暴行下英勇的殉難者。

在我和每一個曾和尤利烏斯·伏契克共同工作並且熟識他的人的記憶裏，他是我們國土上生長的最崇高的人，他是我們民族智慧的結晶。我彷彿看見活着的尤利烏斯·伏契克——看見他的精神的和體格的美。他是一個無畏無疵的英勇鬥士，一個審美家，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一個傑出的苦練的文體家，一個尖銳的譏諷的論辯家。他總是年青的、樂觀的，他永遠熱愛歡樂，熱愛生活和熱愛人類。

尤利烏斯·伏契克確實有一個偉大崇高的人格。但是時代要求我們在想到伏契克同志的時候不僅要愛他的完美的個人品質，更要仰慕、敬重、和感謝他對革命的工人運動，對捷克文化和對人民的事業的重要貢獻。他立下了不少功績，在戰前他的工作就已經贏得人們和進步人士的愛好以及文化界名人的讚譽。我們可以回想一下他做“創造”*週刊的總編輯的工作，他在“紅色權利”**報，“紅色晚報”和“哈囉”報做編輯的工作；我們也可以想一想他在文學歷史上的工

* “創造”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政治文藝週刊。

** “紅色權利”是捷共中央機關報。

作，他在蘇聯考察和做“紅色權利”報駐蘇聯記者時所寫的介紹蘇聯的宣傳文字的工作；還有他積極主動地組織反法西斯鬭爭運動和大規模的知識份子的革命運動等工作。我們要永遠記住他在慕尼黑叛賣時所抱的英勇堅定的立場。

尤利烏斯·伏契克對我們黨的歷史起着重大的作用。我們黨的歷史也將以光輝的字蹟記載伏契克同志在德寇佔領期間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所經歷的最艱苦的地下鬭爭時期所做的偉大英勇的工作。一九四一年當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第一個地下中央委員會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之後，他以不屈的毅力和不畏死亡的精神主動地為建立一個黨的新的地下領導機構而努力。在這個工作中他追隨着許多勇敢的同志和親密的戰友走進了納粹德國的酷刑室和最後走上了死刑場。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是一個卑惡的謀殺的日子。在尤利烏斯·伏契克被德國劊子手處決的那一天，祇有我們黨的地下工作者和他的最親近的友人知道這一個血腥的罪惡，意識到法西斯的劊子手謀殺了一個偉人，斷毀了一顆人類文化的珍寶。我們現在紀念這個日子。在這過去的年月中，我們對英勇的烈士尤利烏斯·伏契克的紀念一天比一天更深刻。在今天已經不僅是我們的黨和全體勞動人民以最深的敬意紀念伏契克同志。尤利烏斯·伏契克的名字已經光榮的列在我們偉大的民族烈士的名列中，我們的文化界也日益珍重他的作品。

對伏契克的紀念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地變為更崇高，更深刻。他的名字已經遠遠地越過了我國國境而傳揚在整個的進步陣營裏。我們知道這是他的遺作“絞刑架下的報告”造成的結果。寫“絞刑架下的報告”這件事本身就代表着伏契克的性格。祇有這樣的英雄才能在法西斯監獄中的恐怖酷刑下還不忘記一個新聞工作者的使命，才能在被移送到德國去受死刑前的最後一刻還堅持寫他的書。這本書已經成為記錄文學中最傑出的記載德國法西斯暴行的作品，它已被譯成很多種語言，而伏契克也因此成為世界進步文學中的偉人。

我們特別感謝蘇聯人民對伏契克的熱愛和關懷。“絞刑架下的報告”在蘇聯已經用各種語言發行了很多版。這本書深刻動人的記載已引起對反法西斯鬭爭的英雄和偉大的作家伏契克的密切注意。在

蘇聯，凡是有關伏契克的生平和他英勇犧牲前最後一刻的記載都被細心地收集起來。在伏契克所熱愛的蘇聯，他的名字被冠以極大的榮譽。當我讀到蘇聯命名中亞細亞的一座高峯為伏契克峯的消息時，我想起一九三五年我和伏契克一同在蘇聯的時候。我記得他有一次從蘇聯中亞細亞考察歸來帶回各種新奇的禮物。這些禮物標誌着遙遠的中亞細亞的蘇聯人民和一位捷克新聞工作者和作家之間的友誼。蘇聯人民以驕傲的心情把蘇聯中亞細亞最高的山峯之一命名為伏契克山峯，因為伏契克英雄的一生和他的英雄的死深深地感動了所有他的讀者。

進步陣營對伏契克的重視使我們更瞭解到我們的責任是必須深刻的紀念伏契克的生平，珍重他所有的著作，加倍地寶貴他留下的遺產。

尤利烏斯·伏契克所遺贈給我們的是異常肯定而不需要我們再加以任何思索的。伏契克同志在他死以前並沒有忘記寫下他的遺言贈給工人，人民，和國家。這也是給全人類，給他的同志們，給你們的。他死以前寫下的最後一句話並不是陰鬱的遺囑，而是詩一般的熾情的呼喚，充滿了樂觀的歡愉，充滿了對人類的愛，充滿了對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的信念。

凡·茨拉夫·柯別斯基

尤利烏斯·伏契克的生平和著作

尤利烏斯·伏契克於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生在布拉格斯米霍夫工業區。他的父親卡瑞爾·伏契克是林霍蒂爾男爵的機器工廠裏的一名鉗工。雖然他整天在鉗床旁邊工作，他却極喜歡音樂和唱歌，他十七歲的時候就在一個工人文藝組織的歌唱團裏唱歌。一九〇〇年以後他曾在斯米霍夫區各民衆劇院裏做客串登台演唱過，後來他成爲一個劇院的正式演員。他在那個劇院裏一直工作到一九一二年，同時他還繼續在林霍蒂爾工廠做工。

伏契克的母親瑪麗·伏契克是一個女裁縫。尤利烏斯童年時代一直生活在母親的身邊，他對母親是溫柔而孝順的。他的幽默和對生活歡樂的熱愛是從父親那裏得來的，他的敏感和憤思却像母親。從父母兩人那裏他學會了愛好唱歌和音樂。伏契克的全家都是有音樂天才的。尤利烏斯的叔父一名字也叫尤利烏斯——是一個通俗音樂作曲家，他的作品到現在還受到民衆普遍的愛好。他的進行曲和華爾滋舞曲更是世界有名的。

伏契克剛兩歲半的時候就登台和斯米霍夫區的居民見面了。他在“辛德瑞拉公主的玻璃鞋”一戲裏擔任一個角色。這小小的演員博得了民衆的愛，而日後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總是熱情地以愛報償着民衆。他常在斯米霍夫各劇院擔任兒童角色，後來在比爾森也常和他的兩個妹妹莉布謝和維拉登台表演。伏契克從小就對書籍特別感興趣。他還沒進學校的時候媽媽就教會了他認方塊字母。他在斯米霍夫區街道上和工人子弟一同遊戲，一塊長大。他很

喜歡上學，念書也很用功。一九一三年伏契克的母親帶了孩子們搬到波希米亞西部的工業城市比爾森，因為父親在比爾森市立劇院當演員。因此小尤利烏斯從斯米霍夫工業區又搬到斯哥達男爵的兵工廠和機器製造廠的所在地。這一切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事。那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土是奧匈帝國的一部，而捷克人民已在奧國的異族統治下將近三百年了。奧匈帝國壓迫着治下的很多異民族，特別是斯拉夫民族，因而被稱為民族的牢獄。被壓迫的民族一直保存着自己的民族意識，捷克人也是不斷地渴望着民族解放。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奧匈帝國是和德國站在一邊的。同年秋天尤利烏斯·伏契克進了中學。戰爭的第二年上，伏契克的父親被徵入伍，並被送到比爾森的斯哥達兵工廠去做工。他在製造槍炮的部門一直工作到一九一九年。這幾年之內伏契克總是在父親做夜班的時候去給他送飯，就這樣他認識了工人的勞動和工人階級的團結。在戰爭的年月裏工人的生活越來越痛苦。要買玉米麵的麵包（當時一種劣等麵包——譯者註）和麵粉都必須排隊。爲了買一塊黃玉米麵的麵包伏契克得用去整個下午和晚上的時間站在隊伍裏。他聽見婦女們訴說在戰場上失去丈夫和兒子的痛苦，他看到她們的愁容和不知道拿什麼給孩子們吃的焦急的眼光。他對這一切特別敏感。在把所聽到的訴苦和對戰爭的咀咒重覆加以思索之後他就開始編寫一本兒童期刊叫做“斯拉夫人”，把他見到的周圍一切都記載下來。這樣他在十二歲的時候就第一次做了期刊的主筆。他把這期刊寫在練習本上借給他的朋友們。一九一六年他又開始編另一本期刊叫做“愉快的心”。他總是很耐心地坐在狹小黑暗的廚房裏用孩子的書法把這新刊物寫在小紙上。這裏面還有圖畫、詩、和謎。在戰爭的困難日子裏，當全國和伏契克全家受着飢餓和貧乏的時候，十三歲的尤利烏斯編了這本幽默的刊物。這表現了他的個性的基本特點：克服障礙，永不陷入失望。沈重的戰爭空氣使成人和兒童都很沮喪，但是尤利烏斯並不屈服。他想通過自己編的刊物讓父母和鄰人發笑，好叫他們——用他自己的話說——“忘掉現時的憂愁”。在這個時期他也看了很多書。書幫助他形成了他的性格和見解。看到特別喜歡的地方他就抄下來。他用美麗整潔的書法抄了捷克人民詩人卡洛爾·哈夫

里契克·波洛夫斯基作的“迪洛爾挽詩”。這是卡洛爾·哈夫里契克·波洛夫斯基被奧國王朝放逐時期所寫的諷刺詩，是他為捷克人民的自由鬥爭的武器。伏契克十四歲時又編了一種期刊叫“捷克人”，從內容來看，這期刊已經很像是文學評論了。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在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和進步人士中起了很大的反響。比爾森各大工廠工人的革命意識也提高了，他們經常進行罷工，反對剝削和反對戰爭。對奧匈帝國的反抗力量愈來愈強大了。一九一七年五月，一座火藥工廠發生了爆炸事件，將近四百名女工失去了生命。這些事情深深地激動了敏感而善於思想的伏契克。他在這時也認識到工人的國際團結性，因為在斯哥達工廠有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和德國人，而他們總是在一起進行罷工的。尤利烏斯·伏契克認為他自己屬於工人階級，而工人的階級意識通過了對戰爭的憎恨並且主要通過俄羅斯革命偉大的榜樣正在不斷增長着。於是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戰爭結束以前半年，幾個大城市舉行了革命的示威。在布拉格，數萬人在“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標語下遊行。十五歲的伏契克認為他有責任參加比爾森工人的五月示威，雖然當時嚴禁學生有任何政治活動。他並不是單獨去參加的。五月一日早上，他在學校前面對同學解釋他們有責任到廣場上去和工人一同示威。結果他說服了同班大多數的學生。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伏契克親眼看見五個比爾森的兒童被殘無人性地屠殺。那一天有些兵士正在往車上裝麵包，一羣飢餓的孩子在旁邊圍着嚷餓，也許有一兩個孩子想從車上拿一點麵包。這時候有一隊兵士被調來維持秩序，他們接受命令對孩子們放了一排槍。孩子們四散躲避，其中有五個就死在街上、便道上和房子旁邊。這些事件和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戰勝榜樣促成了所有大工廠工人的總罷工。所有這一切對十五歲的伏契克的影響可以從他一九一八年九月寫的詩裏看出：

在上面的

“這些下等人在嚷些什麼？

說是國內有人挨餓。

哼！最好的辦法是

進監牢或是去見劊子手。”

在下面的

“先生們，你們說的也許不錯，

可是我們也要笑笑。

等到有一天劊子手把你們吊起來，

我們就會覺得更舒服。

在這首詩裏已經可以聽到反對不公平和反抗主子們的自覺的呼聲。伏契克站在工人階級的隊伍裏，站在受飢餓的一邊。他一生是忠於工人階級的。從他所親身經歷的和親眼看到的，他意識到那樣的世界是不合理的，必須加以改變。他也用了一分力量來改變這世界。他幫助創立了比爾森的工人學生會並且參加該會的工作。他竭力設法了解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情。在奧匈帝國和以後在資產階級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意義是同樣被曲解的。尤利烏斯·伏契克不倦地追求着真理。

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打擊下，戰爭陣線崩潰了，奧匈帝國也因而瓦解，捷克人民所渴望着的獨立實現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同成立了資產階級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宣佈成立。伏契克像孩子般的信任這個日子，他以爲真正的自由到來了。很多年以後他還記得這個十月二十八日：“那是在晚上。工人學生會正在舉行會議。在討論局勢的時候朗誦了維克托·迪克和斯瓦托普魯克·捷赫的詩（兩位著名的捷克詩人——古絲達·伏契柯娃加）和共產黨宣言。所有說話的人聲音都很激動。時間已過半夜了。對面住着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我叫醒了他。他很快的在床上穿起衣服來。他還要知道得更具體一些。自由嗎？獨立嗎？是誰宣佈的？是誰領導的？我想這些都沒有什

麼關係。他對完成了這樣一件工作的人的不信任使我不高興。他很不安地可是很熱烈地解釋給我聽這些問題是很有關係的，因為這樣我們才能知道這新的自由是給誰的。我可是不懂。還要擔心這些幹什麼。當然是給我們的，給所有的人的。還會給什麼別人呢？他對我石著，眼睛裏有一種特殊的表情，然後聳了聳肩。我怎麼能忘記這個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半夜裏就已經有了預見的第一個人呢？（摘錄自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創造」報）

* * *

尤利烏斯·伏契克把奧匈帝國和捷克人民所受的壓迫、剝削和槍殺工人聯在一起，和“在上面的”與“在下面的”之間的不平等、反動的文化 and 檢查聯在一起。他以為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會消滅這些罪惡。所以當捷克斯洛伐克資產階級政府欺騙了人民，當社會民主黨右翼背叛了社會主義，當新政府更加強了資本主義的統治的時候，從小就和工人階級脈息相連的伏契克就成為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自覺的戰士。他發現他對祖國、對工人階級、對真理和公義的愛祇有在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中和在為這些理想鬥爭的時候才能得到表現。特別是蘇聯先為他展開了一個新世界的遠景，後來等他更了解這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以後又為他指出了新生活的現實。

從童年時代起伏契克就勤於閱讀。在他成年以前的一段時期裏他讀了幾百本書。他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所讀的書籍可以表現他探索的方向，因為這些書幫助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他看的書除了世界古典名著以外還有很多捷克作家如依拉賽克、尼姆措娃、尼魯達、索瓦、瓦爾克等的作品。他成年以後仍然一遍又一遍地重覆讀這些書。另外他還讀了許多關於捷克文學歷史和評論的寫作。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間所有他讀過的書他都做了詳細的筆記寫在練習本上，其中有摘錄和評語。伏契克一生總是珍藏着這些練習本，後來他被捕之後這些練習本逃過了秘密警察的手。

一九二〇年當伏契克是中學六年級生的時候他加入了比爾森“真理”出版合作社。社會民主黨左翼機關報“真理報”就是該社出版

的共產黨成立以後這報紙就成為共產黨在比爾森區的機關報。一九二一年當社會民主黨左翼成為共產黨時，作為社會民主黨左翼黨員的年輕的伏契克就加入了這個革命的勞動人民的黨，負起了消滅人與人之間的剝削這一歷史任務。伏契克在黨剛一出世的時候就和它生活在一起，也就是黨教育了伏契克。

一九二一年秋天伏契克離開了比爾森，他要進布拉格大學文學院。可是他沒有錢，為了生活和工作他接受了國家統計局的一個小職員的位置。同時他在大學文學院聽課，他聽到傑出的學者和進步教授尼耶德利、文學歷史教授夏爾達和其他教授講課。他還給每隔一天出版的比爾森共產黨的“真理報”寫稿。“真理報”發表了他寫的關於捷克詩人瓦爾克的第一篇長篇文學評論。這時的伏契克是二十歲。

關於這一段時期伏契克說：“我是在戰爭期間長大的。對年青人說來這是有特殊意義的。戰爭開始時還祇有十二歲的人仍是用孩子的眼光看戰爭結束時發生的事。可是有了我這二十五歲的人的經歷，我必須看到當人們違背着自己的意志去殺人，而自己又充滿了生的慾望的時候，這個世界是有些不對頭了。於是我就開始了批評。對於我，書籍和戲劇是大半個世界。我在這個世界裏尋求，發現有的書說話，有的書說謊，也有的什麼都不說。我認為必須指出說謊的書和啞巴書是不能容許它存在的。這就是在為更美好的世界奮鬥中的我的活動範圍。所以我就開始了寫書和戲劇的評論。（一九三八年為應徵“作家怎樣成為批評家”的徵文而作）。

一九二〇年以後伏契克時常往來於布拉格和比爾森之間，他和比爾森的工人保持着連繫。他繼續不斷地看很多書，並且勤勉地學習當時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所有的馬克斯主義書籍。他也參加文學生協會（布拉格大學文學院的學生組織）的活動，當時這協會是由進步學生領導的。有一個時期他是協會的幹事。一九二三年當他因鼓勵國家統計局的職員支持建築工人進行同情罷工而被革職時，他就在建築工地當小工和在布拉格附近當築路零工。同時從一九二三起他就為進步期刊“社會主義者”和“泉源”寫劇評。

一九二五年一本學生和工人的革命刊物“先鋒”出版了。這刊物的主編者除了伏契克以外還有史維爾馬。史維爾馬後來成為捷克共

席哥特瓦爾德同志的親密戰友。希特勒法西斯黨徒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期間史維爾馬領導了一九四四年的斯洛伐克反法西斯佔領者的起義。他在鬭爭中英勇犧牲了，人民追贈他民族英雄的稱號。

尤利烏斯·伏契克不但爲“先鋒”寫稿，還在學生宿舍裏銷售這份刊物。每一期“先鋒”出版以後他總是左手拿着一疊站在學生宿舍門口向每一個出進的學生銷售。

一九二五年起二十二歲的伏契克就開始爲捷共中央機關報“紅色權利”寫劇評和書評。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他以主編進步出版家私有的期刊“黨”來維持生活。後來當他覺得這樣就不能全力爲社會主義的理想服務的時候他就放棄了這個期刊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捷克斯洛伐克舉行大選。資產階級想利用它在共產黨內的特務，所謂清算派，對共產黨施以致命的打擊。當清算派最後叛賣了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陷入了嚴重的危機。雖然當時共產黨是一個合法的政黨，黨的幹部却都被逮捕下獄，黨員也都被革職或遭受迫害。大選前一個月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勒令所有的共產黨報紙停刊，使黨無法對工人講話。伏契克從一九二七年起就是布拉格大學夏爾達教授所有的文學評論刊物“創造”的編輯之一，這時候他想出一個辦法使黨能至少通過一份報紙對工人和進步人士宣傳。他去見夏爾達教授，要求教授在所有的共產黨報紙被迫停刊的時期把他的刊物交給共產黨。當夏爾達教授同意這樣辦的時候他對伏契克說，“叫他們去見鬼吧，你們是不能不說話的。”新的文藝政治評論週刊“創造”的第一期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四日出版，伏契克是主編者，後來又成爲“所有者”和發行者。

* * *

一九二九年二月召開了歷史性的捷共第五次代表大會，會上獎定了以哥特瓦爾德爲首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伏契克把他整個的年青的精神、天才和工作獻給了這個布爾什維克黨。他成爲一個政治新聞工作者，“紅色權利”報和“紅色晚報”的編輯。

伏契克從十八歲起就開始了他的政治新聞記者的生活。起初他寫劇評，後來寫文學評論，最後成為政治新聞記者。雖然如此，他對戲劇和文學的深切關懷毫無改變。他一向堅決主張政治和文化是不可分的，在討論和共同工作中他爭取了最好的藝術、文學、和戲劇工作者成為捷克政策的支持者。

一九二九年秋天波希米亞北部的礦工進行罷工，伏契克作為“紅色權利”報的記者到那裏去採訪。罷工進行的時期他一直住在北波希米亞。他參加罷工委員會的會議，和礦工一起對那些有資產階級政府的國家機器全力支持的煤礦大王進行殘酷的鬥爭。他和礦工一起出去糾察，防止罷工破壞者到礦裏去工作。他和礦工一樣地受迫害，他在報上發表的關於尖銳的階級鬥爭和礦工困苦生活的報道都被檢查當局刪去。在礦工罷工期間他出版了一本地下刊物叫“罷工”。這刊物是在波希米亞北部的小鎮市和鄉村的地下室裏用油印機出版的。地方警察到處搜捕它的編輯，可是礦工們沒有一個說出伏契克的名字來。

一九三〇年，伏契克最熱切的願望實現了。他和四位工人代表一起被派赴蘇聯。那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當局正以權力所及的一切方法阻止工人階級的代表去訪問蘇聯，深怕他回來後說出關於這工農國家的真理。因此沒有一個代表領到前往蘇聯的護照。伏契克和工人代表們秘密越過了邊界。他總是能設法克服困難的。他們長途跋涉地經過了德國之後終於搭上了一條開往列寧格勒去的船。在列寧格勒伏契克第一次踏上了蘇維埃的土地，認識了蘇維埃的人民。他在蘇聯勾留了將近四個月，旅行了一萬六千公里，從波羅的海邊的列寧格勒經過莫斯科、烏克蘭和斯大林格勒，遠及中亞細亞、夫隆士和中國邊境。他認識了廣大遼闊的蘇聯。在這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已經沒有了工廠主和地主，在這裏自由的人民正開始實行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伏契克熱烈地愛上了蘇聯。他發現，人類最偉大天才的關於沒有剝削和危機，沒有失業和飢餓的自由人的勇敢夢想，在這裏都實現了。伏契克在蘇聯感覺很快樂。在這裏他像和他相處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烏茲伯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其他蘇維埃人一樣地自由。他在一九三〇年八月九日旅途中寫給我一封信，信裏

說：“我一生沒有感覺過這樣自由。這裏實在好：我在蘇聯這裏所見到的現實，遠超過我所敢於想像的情景。向所有的人致最深切的敬意並告訴他們，為這樣的一個目的而奮鬥，是值得的。”

伏契克從蘇聯帶回捷克斯洛伐克的是蘇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蘇聯人民生活的榜樣鼓舞着他，給了他無限力量。他把蘇聯的生活介紹給工人們，他在集會上作報告，他在革命的報紙上寫下他的經歷，他編輯了一本書“明天成為歷史的國家”。

在一次介紹蘇聯的集會上他被逮捕了，後來並被監禁，理由是沒有領取護照私自到蘇聯去。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反蘇報紙千方百計地誹謗蘇聯，政府機關則迫害每一個對這個工農國家說一句真話的人。一九三〇年，伏契克在捷克一個小城市的集會上講到在蘇維埃政權最初幾年抵抗外國武裝干涉的紅軍。他也談到中國軍閥接受了日本的賄賂，派軍隊侵入蘇聯遠東部份而和紅軍接觸的事。他說當那些軍閥的隊伍開到蘇聯邊境的時候，紅軍的武力和宣傳已經產生了影響。中國軍隊帶着軍旗整批“被俘”，並且逼着將軍們也投降。因為這次的演講，伏契克被判監禁十四天，絕食一天。捷克斯洛伐克法庭認為，雖然伏契克說的是中國軍隊，實際上一定是捷克軍隊，而伏契克準是說服了捷克軍隊投降紅軍。這在當時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必須定罪的。一九三〇年伏契克被徵去服強迫兵役，但是一個月後他就被遣返，因為他們不要一個共產主義的新聞工作者。伏契克回來以後仍舊繼續集會演講和寫文章介紹蘇聯。一九三一年他率領了一個人數很多的青年工人代表團秘密越過捷克斯洛伐克邊界進入蘇聯，他自己則留在柏林。從柏林回國的時候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邊界上被捕，然後被送到布拉格的監獄。他從獄中秘密寫給康拉德同志（一位傑出的共產黨新聞工作者，在德國法西斯佔領期間被殺害）的信裏說“我還有很多事要做，他們（指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動派—古赫達·伏契柯娃加）是不會喜歡的。我在受審的時候，從警察方面的報告聽得出他們不願意聽人談到蘇聯。他們很聰明地猜到我們稱頌蘇聯是為了要把它作為榜樣。我講到中東鐵路的保衛戰，講到紅軍的傳單和中國軍隊對這些傳單的反映。警察長先生確信雖然我說的是中國軍隊，我一定指的是捷克軍隊。我講的不過是已經為歷史家記載下來的事實，

可是誰能去跟他辯駁呢？警察長先生要在話外找話，國家檢察署也是這樣。要是他們的眼光再稍放得這一點的話，他們就祇好不幹了。”

一九三二年春天在波希米亞北部爆發了礦工大罷工。伏契克又到了他所愛的北波希米亞。他和罷工的礦工住在一起，並參加他們的反飢餓遊行。他寫文章報道礦工的鬭爭，他幫助組織革命運動。他闡明人民要能真正的生活，那麼資本主義必須滅亡。他號召進步作家和工人站在一起反對壓迫者。

一九三二年秋天伏契克又被徵去服強迫兵役。他被派到斯洛伐克一個較遠的部隊去。捷克斯洛伐克資產階級知道他是個共產黨新聞工作者，非常害怕；因此不讓他進軍官學校，只是把他不斷地從一個部隊調到另一個部隊，以便限制他那很快就在士兵中間產生的巨大影響。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從斯洛伐克寫信回家說：“他們禁止我同時會見幾個士兵，禁止我和任何穿便服的同志談話，禁止我進入同志們常去的房間，甚至禁止我說我平時是在‘紅色權利’報工作，或提起任何有關我的職業的事情”。雖然如此，伏契克還是不會緘默的。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三日他寫了一篇故事叫做“瑞辛雅和正直的執行官”，暴露了斯洛伐克農村中的剝削和農民的痛苦。希特勒在德國當權以後捷共勸促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社會主義黨派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但是社會民主黨和捷克社會黨都拒絕了。伏契克在“創造”上寫了一篇文章對所有的工人和勞動人民揭露了社會民主黨和捷克社會黨的陰謀，敦促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工人不顧一切地根據捷共中央決議的精神組織聯合陣線。

後來伏契克被調回布拉格，到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才解除軍役。他的每一步行動都是受監視的，他的逮捕狀一直沒有撤消。爲了談論關於蘇聯的真象和引起勞動人民愛這個勞動人民的國家，爲了揭露資產階級政府的陰謀政策，他原是要受八個月監禁的，所以他剛被解除軍役立刻就在軍營裏被逮捕，然後就被送到警察局，拍了罪犯照片以後就被移交到刑事法庭去了。可是他很機智地利用了當時官僚法庭規則中的漏洞又逃避了監禁。他被法庭釋放後成爲政治文藝日報“哈囉報”的主編。那時“紅色權利”報和“紅色晚報”經常被檢查和被迫停刊，所以捷共發行了“哈囉報”。伏契克總是被警察搜尋，所

以他不得不過着地下生活。他寫文章都是用的假名。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八月捷共派他到蘇聯去做“紅色權利”報的記者的時候他的隱名生活才算暫時告終。

這次伏契克在蘇聯過了將近兩年。他又在蘇聯國土上旅行了數千公里，再次回到了他的“中亞細亞故鄉”。他撰寫了關於蘇聯人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建設第聶伯水力發電廠和馬格尼多冶金廠的報道寄給“紅色權利”、“創造”、“哈囉報”和捷共婦女雜誌“女播種者”。這些文章在伏契克英勇犧牲後於一九四九年刊印出書，名字是“在親愛的國土上”。除去社會主義的建設以外伏契克最注意的是新型的蘇維埃人物的成長。為共產黨所解放的蘇聯各民族歷史性的新生使他十分神往，特別是那些從封建主義時代直接跨入社會主義時代的中亞細亞各民族。

‘人。巨大的工業是爲了人而建設的。現在人成了巨人，成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大前題。第一次五年計劃英雄主義的犁耕鋤了數百年以來荒蕪在落後中的一億六千萬生靈的田地，現在青翠的綠苗長起來了。人和人類社會的關係現在開始澄清了。四年以前他們說：‘看我們是怎樣成長的！’我們看見的是新工廠。現在他們說：‘看我們是怎樣成長的！’這回我們看見的是廠裏的工人。’（伏契克著“在親愛的國土上”）

一九三六年夏天伏契克從蘇聯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在一篇關於一位格羅斯尼女唱歌家的文章裏他說他自己“已經成了一個東方人”。這個說法不祇表現一位傑出的愛他自己民族的捷克人的新生，也表現整個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複雜問題和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發展的方向。伏契克指出了真正進步世界的重心已經移到莫斯科這一歷史事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戰士和捷克民族優秀的文化工作者伏契克就是這個事實的偉大榜樣。伏契克歸國後又回到“紅色權利”報編輯部工作。他的逮捕狀一直沒有撤消，所以他不得不過着半公開的生活。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時伏契克是西班牙人民反對法西斯獨裁者佛朗哥的最熱烈的支持者。當時蘇聯已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並按着斯大林憲法正實現着社會主義，伏契克不斷地引蘇聯爲偉大的榜樣。伏契克竭力主張所有正直和